

# 从北美到北非，从西欧到东亚

## ——全球不平等状况及各自成因扫描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2017 Jackson Hole 会议上，耶伦与德拉吉避谈货币政策，却大篇幅地论述了金融监管与提振增长率的问题。对后者而言，社会分配不平等可算是阻抑生产率提高与经济增长的一大障碍，我们就不平等问题之前已做过多番论述，但大都集中于个别国家，或聚焦于某些特定领域的不平等，如企业间不平等。最近，BIS 刊文，从宏大的全球视角着眼，贯穿北美、中东、北非、南美、东亚东南亚，以近 30 年来的变化情况、原因与结果及政策应对等方面切入，对全球不平等问题作了非常详尽的论述。如果您对以下两个问题感兴趣，推荐一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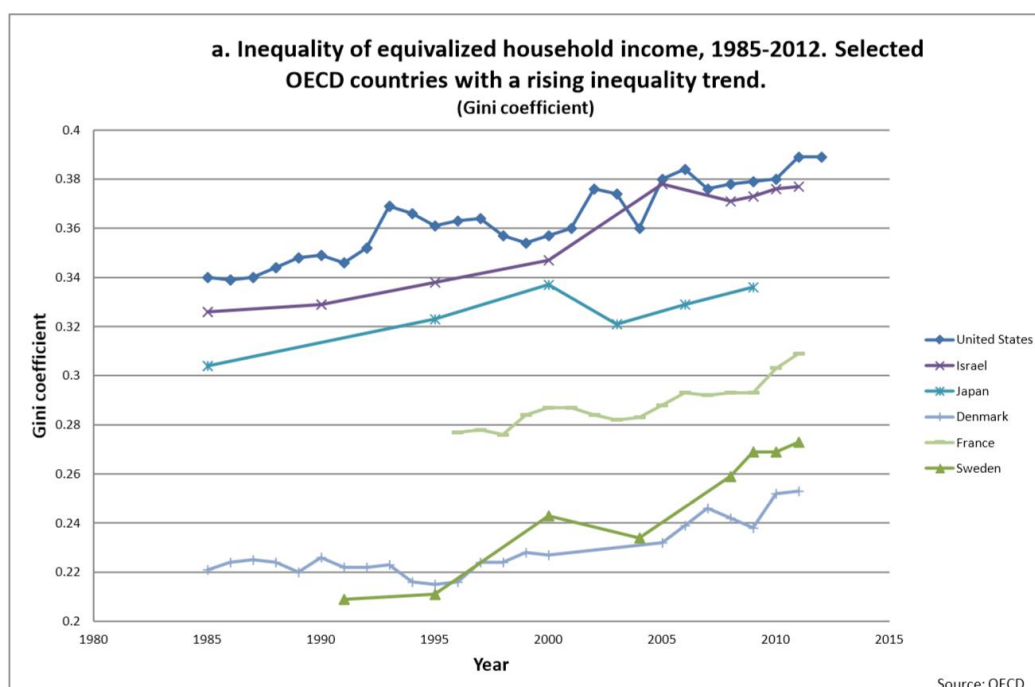
- 1.过去 30 年，真的所有国家不平等程度都在加剧？哪些国家不平等状况企稳甚至在减小？
- 2.在基尼系数与前 1%收入者占社会总收入之比例两种测度不平等的框架下，测度出的各国不平等状况有何差别？

### 等价化的可支配收入（equivalised disposable income）之不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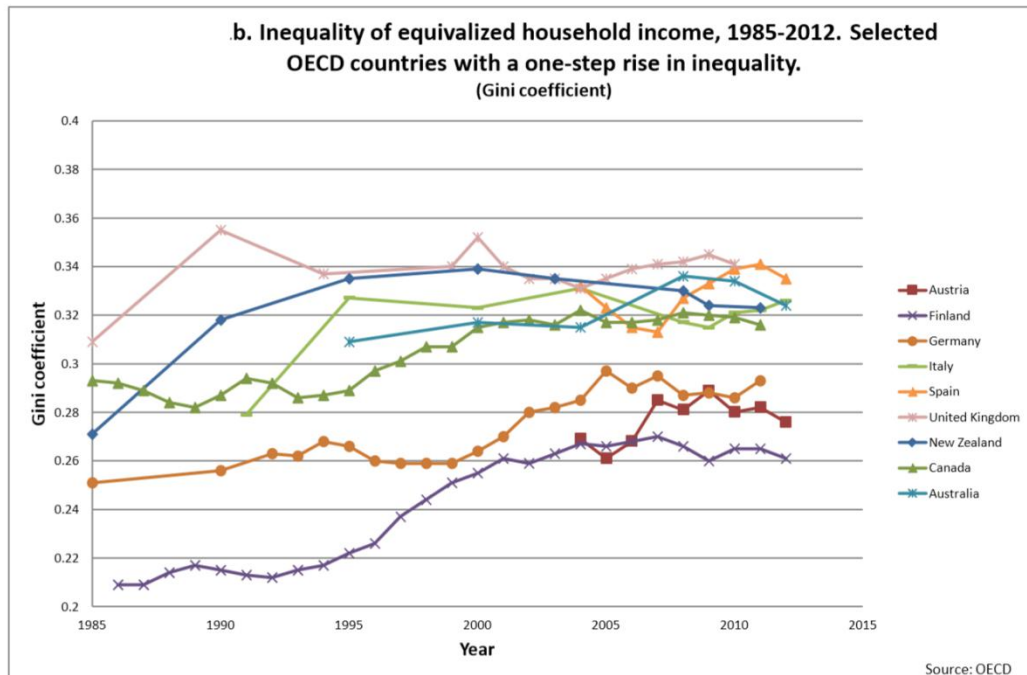
“等价化的可支配收入”，即将一个家庭所有收入（工资、投资、社会转移支付等）相加，减去税收社保等，用余额除以家庭成员按年龄处理后的权重人数（OECD 的做法是第一个成年人算 1，第二个及往后的 14 岁以上者算 0.5，14 岁以下的儿童算 0.3）后所得的结果。这是衡量不平等时最常用的参数。在某些国家，计算等价化的可支配收入之方式不是利用家庭总收入，而是利用家庭消费总支出，这种方式有时被认为更具优越性，因为可以减小收入波动对统计结果的影响。不过具体采用哪种方式，主要由所在国哪种数据更易获得决定，通常，发达经济体多利用可支配收入作数据源，而新兴经济体则多利用消费状况作数据源。

下面四幅图，显示了 1985 年-2012 年 21 个 OECD 国家与 7 个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印尼、巴西与哥伦比亚）等价化的可支配收入变化情况（以基尼系数为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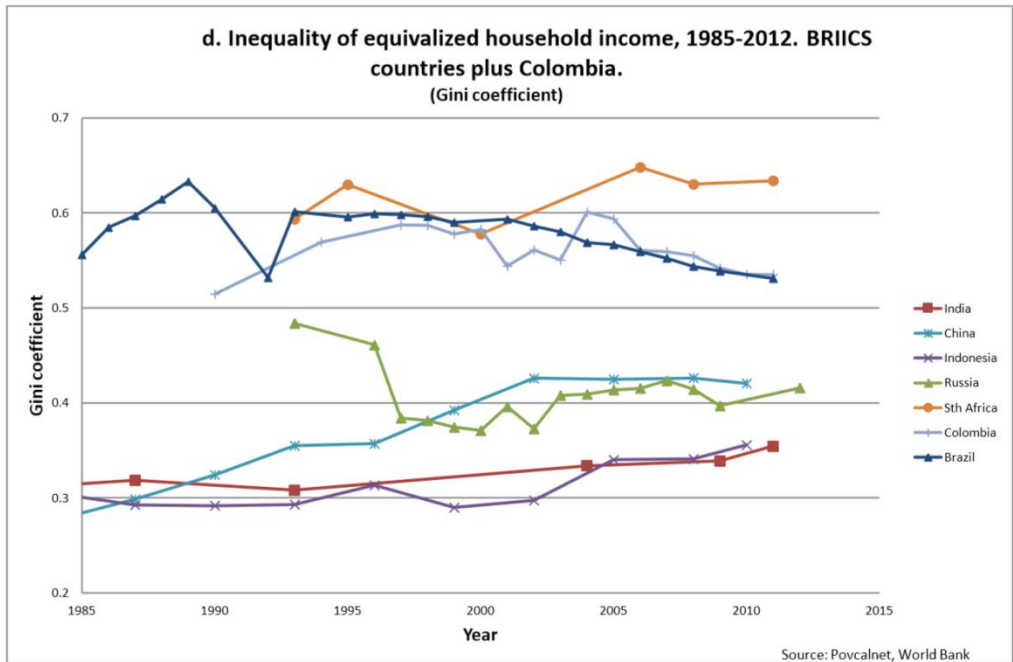
**Graph 1. Inequality of disposable household income in selected OECD and emerging countries: 1985–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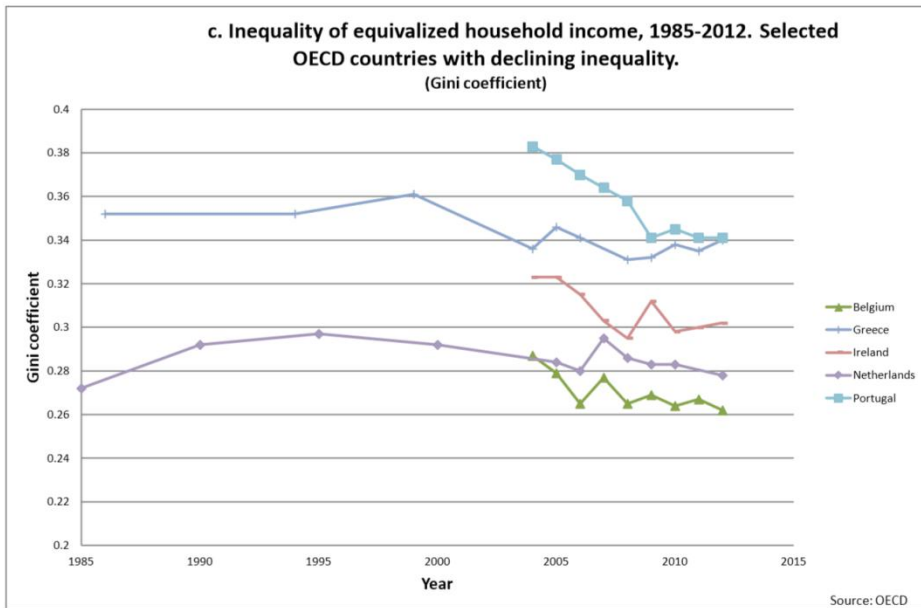
上图显示了近 30 年来不平等程度不断在提高的国家。其中，美国（深蓝色折线）之不平等程度从头到尾都是最高，但日本、以色列、法国的不平等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令人意外地是，一向以高社会福利与平等主义著称的北欧国家瑞典与丹麦，其社会不平等程度在过去 30 年也不断加剧（最下面的深绿色折线与淡蓝色折线）。概言之，这一组国家 30 年来总体上基尼系数都提高了 0.03 以上，而合意的范围仅仅在 0.01-0.015 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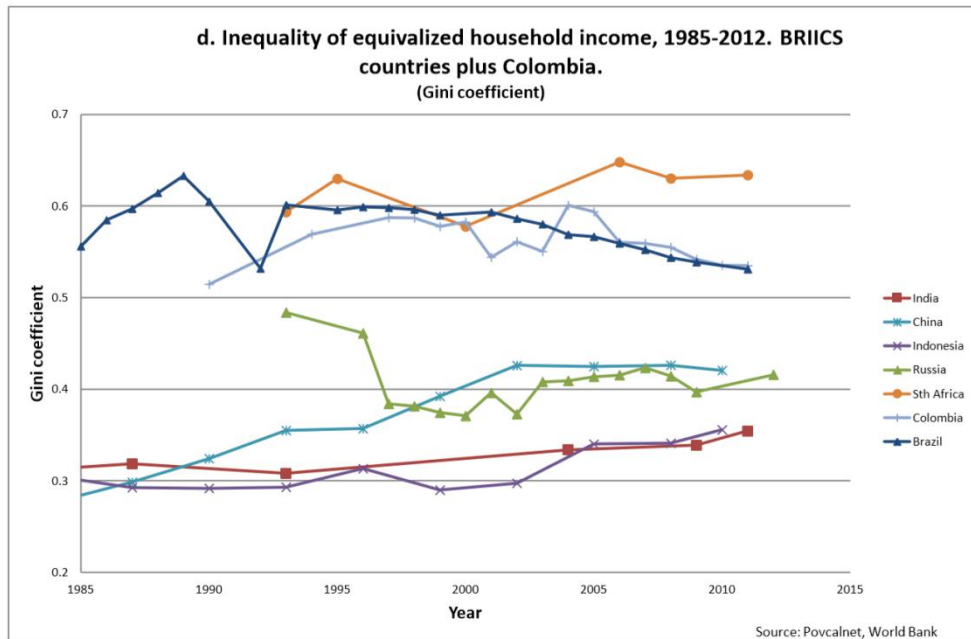
上图则显示了在过去 30 年中，因种种原因收入不平等程度有着一次性提高的国家，英国（粉色）便是其中最典型者——1980 年代后半期，其基尼系数陡增，随后总体保持稳定。2000 年代前半期的德国与加拿大或 1990 年代的芬兰也发生过类似现象，这大都是由特定事件或改革所致：如英国的撒切尔改革、德国的哈茨法案以及芬兰加入欧盟后的经济复苏等。综合图 a 与图 b 可见，在 21 个 OECD 国家中，有 13 个在过去 25 年来不平等程度都有显著增长。



**Graph 1 (continued). Inequality of disposable household income in selected OECD and emerging countries: 1985–2012**



不过，也并非世界上所有国家在过去 30 年来不平等程度都在加剧。上图就显示，自 1980 年代中期以来，希腊与荷兰等国不平等程度就总体上维持不变。



最后，上图显示了 7 个新兴经济体过去 30 年基尼系数变化情况。总体上，除了巴西（深蓝）与哥伦比亚（淡蓝），其他国家不平等程度都有所加剧。

对于上面的图表没有覆盖到的国家或地区，其不平等程度亦体现出丰富的多样性。

在东南亚，孟加拉国不平等程度提高，越南持稳，而泰国则有所下降。

在中东及北非，除了战乱国，大部分国家不平等程度较为稳定。

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虽然数据比较难以获取，但在可获取的数据中（通常最多 15 年），加纳、坦桑尼亚、赞比亚的不平等程度在提高，塞内加尔与喀麦隆较为稳定，而埃塞俄比亚、尼日尼亚与乌干达的波动则十分强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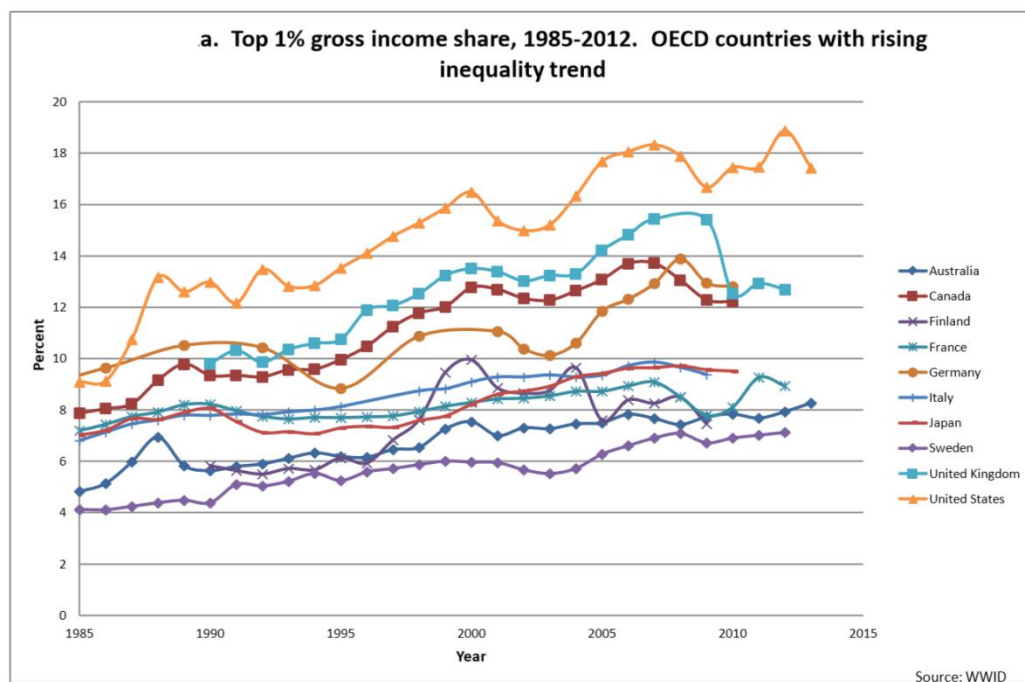
总而言之，与惯常认知不同，实际上并非所有国家在过去 30 年内不平等程度都在加剧（比如中东与北非等地），而那些不平等程度加剧的国家也不都是 30 年来一直在加剧（比如英国德国）。但这些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就是将“等价化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作为数据源的基尼系数框架下，如果换了另一套测度不平等的方式，那么结果又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呢？

**测度不平等的其他标准——前 1% 收入者之收入占社会总收入之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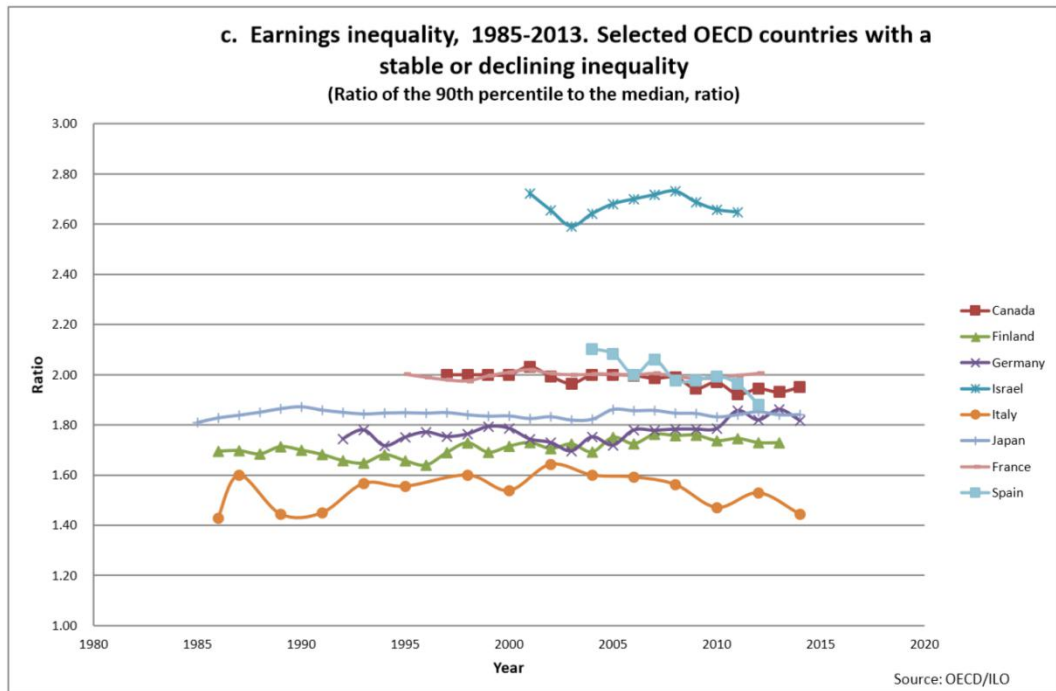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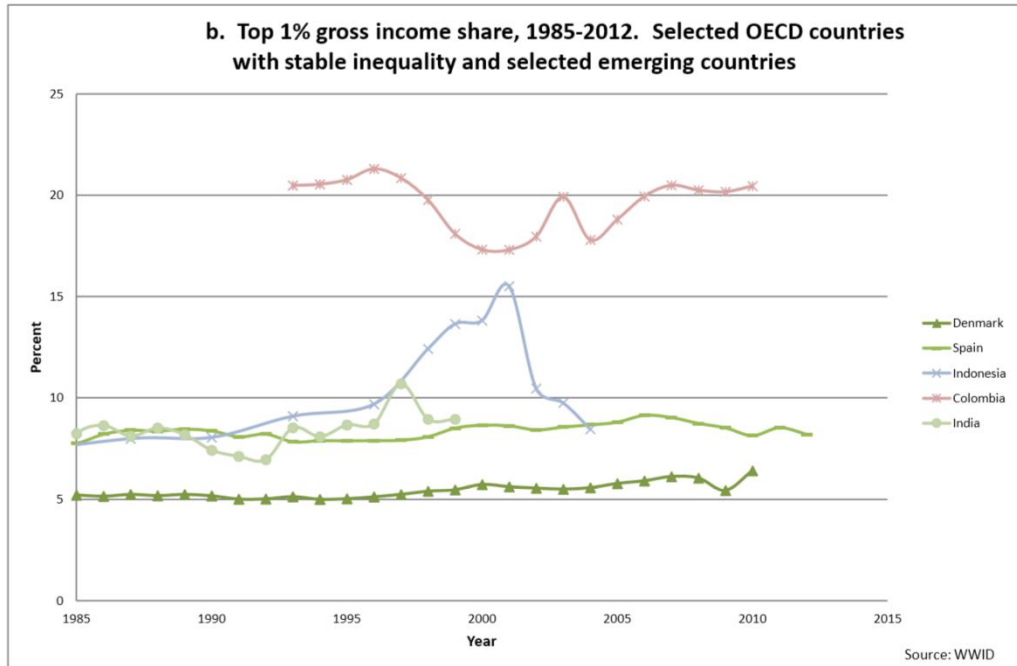
除了用等价化的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不平等的测度外，还有一种衡量不平等的方式，即考察收入位列前 1% 的家庭占有社会财富之百分比。此外，还有一种方式即利用社会位列第 10% 收入者的收入除以社会收入水平的中位数 (P90/P50)，

下面 4 幅图，便是利用这两种测度方式之结合对 30 年来全球不平等状况再考察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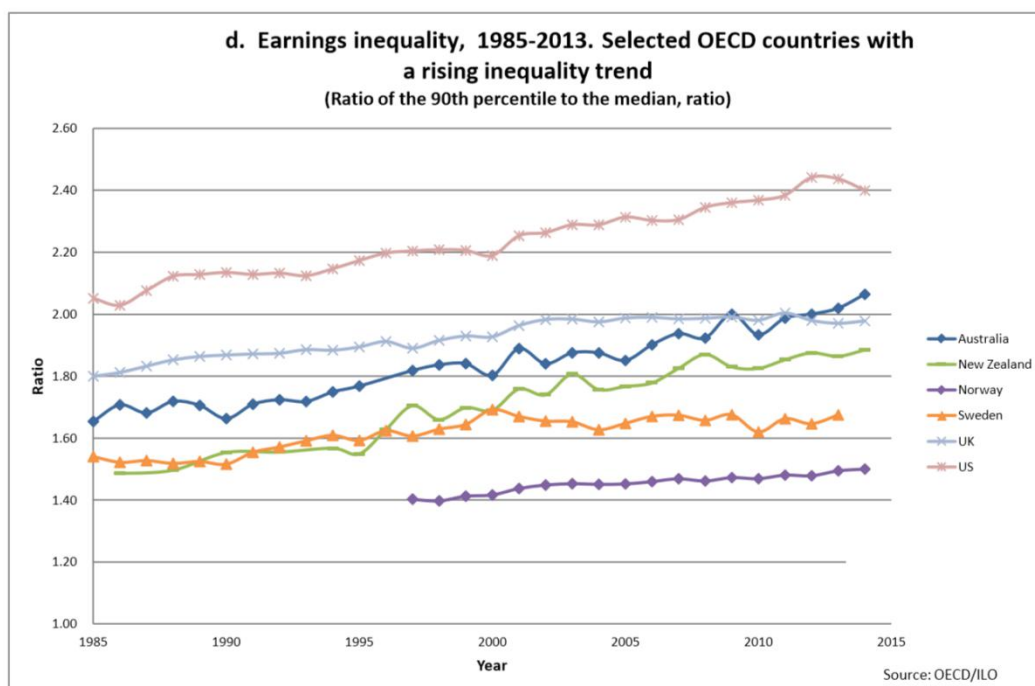
**Graph 2. Inequality in selected countries: top 1% share of gross income and P90/P50 ratio of individual earnings: 1985–2012**



**Graph 2 (continued). Inequality in selected countries: top 1% share of gross income and P90/P50 ratio of individual earnings: 1985–2012**



**Graph 2 (continued). Inequality in selected countries: top 1% share of gross income and P90/P50 ratio of individual earnings: 1985–2012**



与基尼系数下的不平等考察对比，可以发现只有美国、挪威与瑞典其不平等程度始终在加剧。有趣的是，在基尼系数测度下除了撒切尔改革时期导致不平等程度骤增随后便一直保持稳定的英国，在此测度下显示，其前 1% 收入者收入占社会总收入之比一度从 9.8% 提高到了 13.3%，雇员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提高了大约 10%，因此如果某人以第二种测度为基，他或将得出英国的不平等在过去 25 年内始终在增长的结论。而德国则不同，虽然在基尼系数的测度下，其在 2000 年初不平等程度骤增，但在前 1% 人群的收入占比上，则显示其水平基本保持稳定。

新兴经济体在前 1% 人群收入占比的框架下得到的结果则与基尼系数下的结果大相径庭。在前 1% 收入占比下，印尼 1990 年代末不平等程度剧增，在 2000 年中期下降，而在基尼系数下，其前一时间段不平等程度比较稳定，后一时间段却剧增。2000 年代后半期的哥伦比亚与 1990 年代中期的印度也呈现出了两种框架下结果的巨大差异。

那么，各国间的不平等究竟是由何导致的呢？实际上，研究发现导致各国不平等程度之分化的原因千差万别，其中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普适性的因素，



另一类为特异性因素，让我们从普适性的因素开始谈起。

### 造成不平等的普适性因素——全球化与技术进步

在发达国家，全球化与具有技能偏向性的技术进步被认为是造成资本收入占比提高而低端劳动力工资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以美国为例，技术进步与中国入世后对美国出口的挑战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压力。近期研究甚至表明，在一定时间内，中等技能劳动力受全球化与技术进步之影响的程度可能比低端劳动力更大，因为原来的低端劳动力可逐渐改行从事个人服务行业。

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吗？

标准贸易理论认为，南北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有利，提高了其劳动者收入，从而减少了不平等，但该假设之所以成立是因为预设了一个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不过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存在。所以，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社会不平等之影响是模糊的：它减少了社会中下层间的不平等，但却提高了上下层之间的不平等。如果说对发达国家而言，贸易与金融全球化是造成其社会不平等的全球化因素之主要体现外，那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人口的全球流动——高技能劳工在发展中国家任职，其收入水平往往参照发达国家，这就在客观上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

不过，以“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全球化”等大词来论述全球不平等问题的多少显得有点空泛。下面，我们来谈一谈造成不平等的一些特异性因素。

### 造成不平等的特异性因素

说全球化与技术进步乃是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不平等程度加剧之根本动力确实没错，但更直接影响不平等程度的实际上是各国具体的机构建制与方针政策，它们或放大全球化/技术进步对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影响，或减小之。而这些机构建制与方针政策往往因国别差异具有很大的不同。

在影响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政策中，税收政策最为典型。以美国为例，Bargain等人认为，1986-1988年间美国基尼系数增长的1.3%中，有1%是由1986年的里根税改所致。相似地，Clark与Leicester认为，1979-1990年间英国基尼系数的增长，有40%同样是由于撒切尔政府的税收与福利改革所致。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

比如 2004 年税改的德国等。新兴经济体也是如此：2003-2009 年巴西基尼系数的下降中，有 20%被认为与有条件的现金转移项目（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me）改革相关。

除了税收政策外，**最低工资法案对社会不平等状况也有很大的影响**。在美国，1980 年代贫富差距显著提升时，降低了的实际最低工资可提供 30-40%的解释。在巴西，最低工资的提高可解释 2001-2005 间不平等程度降低的 36%。不过，有些看起来似乎与社会不平等密切相关的政策，实际上与不平等的关联却并不密切，比如**劳动市场政策与私有化**。在德国，有观点认为旨在改革失业补偿系统的哈茨法案乃是造成 2000 年代德国社会不平等加剧的关键原因，但实际上两者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明显，因为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在发生作用。

相反，一些看似与不平等无关的因素，实际上对等价化的可支配收入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隐藏作用，比如人口的年龄与教育结构，以及家庭构成（结婚？同居？几口人？）。2011 年 OECD 的一份关于不平等问题的报告指出，由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高教育水准的男/女倾向于寻找同样高教育水准的另一半组成家庭，这样的家庭总收入往往很高，该现象解释了 OECD 国家过去 20 余年基尼系数增长原因中的 22%，而技术进步则解释了 40%。有趣的是，男性就业率的降低（多见于低收入家庭中），往往导致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提高，而与此同时女性就业率的提高，则恰恰起到与前者相反的作用——使社会不平等程度降低。

虽然上面提到了种种更为具体的影响社会不平等的因素，例如税收政策、最低工资法案、人口与家庭结构等，但必须强调，这些因素往往并不能脱离全球化与技术进步两个源动力而存在。比如，自 1980 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发达国家边际所得税的降低（尤其是与资本所得相关的部分），很大程度上是相关政府当局为了减少本国人员及资本外流的激励——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人员与资本的跨国流动越发常见。

## 不平等的代价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论述了过去 30 年来全球不平等状况的变化及其可能的成因。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社会不平等程度太高会带来哪些问题？

首先，如果不平等体现为机会不平等，即某些人群由于其族裔、家庭背景等原因无法享有较好的教育、信贷、好的工作乃至司法保障等，这不仅将导致其个

人能力的浪费，还会降低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继而反过来进一步提升社会不平等。

其次，社会不平等使财富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从总体上看，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小于中等群体与低收入者的合集，因此贫富差距越大，实际上社会总体需求受到的负面影响就越大，这也会削弱对国内市场的投资，两者都会拖累一国经济。

有趣的是，不平等带来的第三个问题恰恰来源于反对不平等——即再分配。再分配政策虽然可以抑制不断上升的不平等，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运行效率。此外，不平等程度太高，社会不满会加剧，民粹主义或抬头，这给国内乃至国际政治都会造成一定的压力。

不过究竟什么算是“太高”的社会不平等程度呢？这个问题注定没有统一的答案，因为社会不平等程度很大意义上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硬性标准，而是一个与普通国民对“不平等”的认知及其忍耐度有关的主观概念。

传统上，政府对抗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措施便是再分配，而再分配的具体手段则是税收政策——比如提高高收入者税率。但问题在于，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人员与资本的流动更加自由而频繁，因此一旦一国政府对高收入者征税额太高，其很可能直接移居其他国家，而这对移出国又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因此，目前各国政府在应对不平等问题时应设法调整思路——从“劫富”转向“扶贫”，比如积极增加教育投入并扩展职业培训等。

## 结语

过去 30 年，总体上看，全球大部分国家的社会不平等程度都在提高——包括一些向来以平等主义和高福利著称的北欧国家，如瑞典等。但情况也并不都是如此，有些地区（如中东及北非）的国家，其社会不平等程度不仅持稳，有的还有所下降。而且，不同国家社会不平等加深的轨迹也是不同的，有些国家（比如美国）是一直在加剧，而有的国家（如英国德国）则是一次性加剧后一直持稳。当然，上述都是以基尼系数为测度的结果，如果用前 1% 收入者之收入占社会总收入之比来看，则又将是另。

在造成不平等的原因上，全球化与技术进步是两个根本性的原因。而在这之外，不同国家又有不同的因素，税收政策、最低工资法案乃至人口与家庭结构都

对社会不平等有重要影响。

社会不平等程度过高，既能通过机会不平等降低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并恶性循环加剧不平等；也会通过影响总需求而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甚至还会因为为了促进平等的再分配政策减小经济效率。同时，不平等也为民粹主义之滋生提供了土壤，而民粹主义则可能导致国内与国际政治局势动荡。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面对不平等，一味地通过加强对富人的税收是低效甚至有时是有害的，因为高收入者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可以很轻易地实现财富与人身的跨国转移。相反，政策焦点应更多关注于如何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这包括提高教育支出，扩展职业培训等。

**编译：张纬杰**

**参考资料：**

François Bourguignon, World changes in inequality: an overview of facts,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policies, BIS No.654, 2017.08。